

JOURN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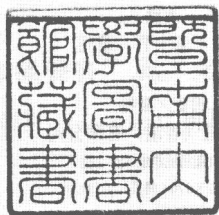
and Social Change

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

俞旭 郭中實 黃煜 主編

中華書局

俞旭 郭中實 黃煜 主編



中華書局

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

□

主編

俞旭 郭中實 黃煜

□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馬坑涌道 5B 2 樓

電話：27150176 傳真：2713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

印刷

天彩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華蘭路 16 號

萬邦工業大廈 14 樓 A 室

□

版次

1999 年 9 月初版

© 199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962 9

變遷的指標 互動的成果

朱立

新聞傳播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變遷的指標，同時也是重要的催化劑。一個變遷的社會是“活”的，哪怕困難重重，也充滿了希望。在過去二十年，內地、台灣、香港的發展正說明了這一點。隨着兩岸三地互動的增加，新聞傳播只會更加蓬勃，而社會變遷也只會更加劇烈。

社會的典章制度和社會的傳播活動都需要有人整理分析，因為我們希望能記錄走過的道路，但我們更希望能解決變遷中出現的問題，並進而減少及避免問題出現。在過去，整理分析典章制度者多矣，但從事新聞傳播活動者雖多，致力整理、分析者則可謂少之又少。二十年來政、經、文變遷，此現象早已改觀。這本書，以及其他近年出版的選集與專著，便是明證。

學術的進步、思想的推演，不能閉門造車、敝帚自珍，必須在激盪中延續、發展；大眾傳媒學的奠基人宣偉伯（Wilbur Schramm）生前常說要“思想碰得吱吱叫”，正是此理。兩岸三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經歷不盡相同，但大家有共同的語言與歷史，互動只能增加了解，促進發展。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家派克（Robert Park）研究十九世紀的報紙，說它是“城鎮的話題”（talk of the town）。有共同的話題，社會才能整合、才能發展出社區感。大眾傳播媒介是現代社會的“話題”，記錄社會變遷中的喜、怒、哀、樂，幫助現代人認識和面對變遷，重要性顯而易

見。兩岸三地的新聞傳媒學者也應有共同的“學術話題”，出書、出選集、出期刊，都能提供話題，有了共同的話題，才能求同存異。本書選集了兩岸三地學者的論文，觀察分析的角度可能不同，探討的具體問題不一樣，但其促進整合則一，編者的貢獻也正在此！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是鑽研新聞傳播課題的重鎮，我們樂意做個公用的學術論壇，讓各家思想、言論“碰得吱吱叫”。這本書是引玉之作，傳理學院的同仁很高興，也很榮幸能在兩岸三地學術互動與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積極促進的角色。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香江瞥未居

探索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 互動的真諦 (前言)

俞旭 郭中實 黃煜

法國年鑑學派史學大師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曾用“歷史時間”的三分模式，將社會歷史變遷分解為三個時間單位，即顯示社會形態演進的長時段(地理時間——總體結構)、顯示社會重大趨勢變革的中時段(社會時間——局勢)以及社會當代變遷的短時段(個體時間——新聞事件)。¹布羅代爾雖然沒有直接論述新聞傳播的影響，但他的社會歷史變遷時間三分法，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革之間的某種辯證內在聯繫。

(一)

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是個大題目，也是個非常具有研究探討意義的題目。究竟是前者影響後者，還是後者帶動前者，兩者如何產生互動，多少年來，一直激勵着學者嘗試用不同的理論和方法去探索其中的真諦。

早在十九世紀末期，美國三位思想家庫利(Charles Cooley)、杜威(John Dewey)和派克(Robert Park)就已經開始研究現代傳播在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庫利在

一篇題為“社會變遷過程”的文章的結論中指出：社會變遷是各種影響力競爭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種種思想和行動競相較量以博取社會認同，而傳播則在其中起着決定的作用。²在這裏，庫利顯然將傳播作為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變量加以考慮；各種社會思潮之流行及社會行動之展開都和傳播有着直接的關聯。當代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指出現代傳媒具有強大的社會控制力的同時，更辯證地闡明它對社會變遷所起的推動作用。³

回顧傳播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察覺，自從十五世紀中葉，德國古騰堡發明世界上第一台金屬活字印刷機，揭開大眾傳播的帷幕後，傳播科技的發展突飛猛進，令人目眩神移。1844年，美國人莫爾斯發明有線電報，開創電訊新聞之端；1915年，美國西屋電氣公司製作收音機的廣播節目，拉開了收音機廣播事業的序幕；1926年，英國首先試驗電視成功，抓起了傳播事業發展的新一章；1953年，彩色電視在美國正式面世，使整個傳播業更加色彩繽紛；電腦自1945年由美國人艾克特和曼奇里發明後，發展可謂一日千里，更新換代的週期愈來愈短，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生活、工作和處理、貯存、傳輸信息的方式和速度；九十年代初，國際互聯網絡誕生後很快衝破種種障礙，形成燎原之勢，引導全球步入資訊高速公路。如今，新聞傳播已經開始邁向以數碼化電子傳播為技術特徵的信息時代，新的電子媒體不斷衝擊原有的傳播產業和市場，其傳播內容無論在數量和質量方面都與以往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每一次傳播科技的重大創新，總是伴隨着社會的變遷。對此，加拿大政治經濟學者殷尼斯（Harold Innis）認為：“任何社會的傳播媒介，都會左右社會組織形態和人際結合方

式。”⁴ 另一位加拿大學者，殷尼斯的學生但名氣比老師更大的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更斷言，每一種新媒介的問世和普及標誌着社會形態的轉變。三十多年前麥克盧漢所作出“媒介即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論斷以及“地球村”即將到來的預言⁵，如今正為眾多的事實所證實。

（二）

麥克盧漢雖然常被後人批評為“媒介中心論者”，但是，如果撇開麥氏的一些煽情、誇張的言辭，他的論點無疑同馬克思生產力決定社會變革的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近年來傳播學界重新掀起“研究麥克盧漢熱”，決非偶然。通過考察傳播歷史，麥克盧漢認為，某一種特定傳播媒介之出現，一方面拓展了人類的交往能力，從而導致相應的社會關係發生變動；另一方面亦決定並規範了這種交往能力的組織形式和操作典範。⁶

就方法論而言，麥克盧漢的“媒介中心論”與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論”都運用了類似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理想類型（Ideal Type）的概念模式來闡述社會變革的內在動因。按照韋伯的論點，理想類型的構造是借助“單方面地突出一個或更多方面，通過綜合許多彌漫的、無聯繫的、或多或少存在、偶而又不存在具體的個別的現象而成的，這些現象則根據那些被單方面強調的觀點而被整理於一個統一的分析的結構中。”⁷ 韋伯反覆強調，任何理想類型的選擇和構造都是分析社會的可能途徑之一，對象觀察的角度不同，獲得的結果就不一樣。具體方面，理想類型之構造本身不是探討的目的，而是一種途徑，一種把握對象的方法。韋伯對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關係的研究，就是

一個經典例子。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將新聞傳播作為研究社會變遷的切入點和對象特徵，亦是一種理想類型選擇的構造。這種理想類型的構造突出新聞信息的製作、流通和傳播媒介創新發展在社會變遷中的功能，從而探究這種互動關係的內在動因，把握社會歷史演進的趨勢、潮流。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有一段中肯的評語，對理想類型作了精當的分析：“理想類型這一概念是韋伯思想的好幾種傾向的結果。它是與理解概念聯繫在一起的，因為任何理想類型都是整理某個歷史整體，或某些事件的連貫性本身所固有的各種可理解的關係。此外，理想類型與社會及現代科學的特點，即理性化的過程，聯繫在一起的。……最後，理想類型又是與因果關係的分析性及部分性觀點聯繫在一起的。理想類型確實有助於把握歷史上的個別事件或總體，但它所把握的只是總體的一個部分，它保留了因果關係的部分性，即使它在表面上涉及整個社會，亦還是如此。”⁸ 阿隆這段評語，將韋伯的理想類型概念的方法論意義和其局限性解釋得甚為透徹，對我們研究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極有幫助。

（三）

傳播科技帶來一次又一次的傳播革命，促成了新聞傳播的形式、功能和範圍的發展，擴大了新聞傳播對人類社會和人們行為的影響。於是，新聞傳播滲入社會各個領域的廣泛層面，與社會變遷產生明顯的互動作用，此間出現的種種關係，成為許多學者熱衷談論的話題。例如學者古爾德納（Alvin Gouldner）在詳盡分析了現代性（Modernity）的理性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這

三要素的歷史演進過程後，明確指出：新聞媒介是現代性發展的催化劑和推進器，沒有新聞信息的大規模流通和傳播媒介的不斷更新，現代性運動的興起和擴展是無法想像的。⁹

傳播學者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在《空間感受錄》中提到，“媒介的變化導致社會環境的變化，後者決定人民的行為”。他進而指出，媒介不僅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環境中人們交換信息的工具，它們本身就是新的社會環境的塑造者。¹⁰

新聞傳播是大眾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實，如果將整個人類社會視為一個超級系統，新聞傳播只不過是一個子系統，它的成長與蛻變，並不是在真空中發生，而是與其他社會系統交織成為極複雜的相互影響關係。新聞傳播固然是因應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然而，新聞傳播本身釋放出來的能量，它所帶動生產、交往、生活方式的改變，在在構成了社會變革的張力，某種程度上而言，它就社會變遷的一種誘因。

不同的政治體制對新聞傳播有不同的控制方式，比如說社會主義的新聞傳播以政治宣傳為目的，資本主義的新聞傳播以市場導向的言論自由為依歸，但這只不過是新聞傳播的培育渠道不同，由始至終，新聞傳播顯然脫離不了政治制度、經濟形勢、社會環境、文化價值、法律規範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但是，新聞媒介的重要性又是不言而喻的，在西方它與行政、立法和司法相提並論，被稱為深具影響力的“第四等級”。新聞媒介不僅是政治權力、意識形態建構、文化認同以及生產消費的一種綜合體之整合，而且當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傳媒資訊穿透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家庭而成為全體民眾的公共品。正如新聞學者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所指出的那樣：新聞媒介所構造的一整套符號世界，通過日常傳播的滲透，早已為社會成員

所共享。新聞資訊於是便成為人們變革社會，採取政治行動的一種寶貴的資源。¹¹ 對舒德森而言，新聞是一種“公共知識”，而媒介則是傳遞這種知識的途徑。這種“公共知識”的特殊性質（大量生產、快速傳播、廣泛滲透）使其成為社會變革力量中的最活躍的要素，也因此，它歷來是社會各階層和利益集團高度關注的焦點，爭奪闡述權的對象。

近些年來，中國內地、台灣和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內地走向改革開放，經濟層面的改革成效顯著且不斷向縱深挺進，但政治層面的改革卻相對滯後；台灣走向民主政治，兩岸民間往來頻繁，而兩岸統一卻荊棘載途；香港走向港人自治，政治局勢呈現相對順境，經濟形勢卻陷入逆境。與此同時，中、港、台三地的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也引入注目。

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相似，華人社會中新聞傳播發展有科技化、專門化、商品化、媒介經營集團化、全球化的趨勢。現在，新聞傳播對社會的功能，已經不再局限於監察環境、協調社會、傳遞文化、提供娛樂等早年理論上。有學者指出，要更好地了解現代新聞傳播的性質，必須從其組織、政策、權力等角度去剖析。近年來，全球化和信息社會來臨的背景，又使新聞傳播的作用與影響大大擴展，使研究呈現多元交叉之勢。¹²

這本論文集的主線是華人社會中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的互動。書中十六篇文章的作者，多為中港台頗有影響的新聞傳播研究者。他們從宏觀、中觀、微觀的不同角度，對新聞傳播的傳統運作特徵、信息社會新聞傳播的趨勢、兩岸三地新聞傳播的影響力、新聞傳播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作用等，進行了寬廣的掃描和深入的剖析，進而透視近代及現代華人社會中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

的互動關係。

宏觀方面，潘忠黨、魏然採用抽樣調查的方法，從文化的角度，對內地傳媒內容的日漸豐富與文化價值觀的改變之間的關係，在實證和理論層面上作了頗為深刻的剖析和論述；杜耀明對香港殖民統治和香港新聞自由等新聞傳播特色的形成，從歷史的角度，作了相當詳盡、深入的回顧和闡述，提出了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分析架構；黃旦、丁未的論文概括和分析中國新聞思想史上的“輿論喉舌”、“職業組織”、“指導機關”這三種報刊角色觀，雖屬歷史探討，但對了解當今中國社會的變化與新聞傳播之間的互動不無啟示；閔大洪的論文考察了電腦國際互聯網絡（Internet）對中國內地新聞傳媒的威脅和衝擊，針對性、批評性頗強；趙勁分析了信息化時代下中外電子報刊的特點、截體、發展狀況與前景，揭示一些今後可作深入探索的課題。

中觀方面，魏永徵的論文從中國現代法律制度的角度對新聞自由進行探討，翔實具體，富真知灼見；孟建以央電視台為個案，對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國策以來發生的社會變遷與中央電視台終極性及工具性傳播價值觀演進的互動關係，作了清晰的梳理和精闢、透徹的分析；劉向群、劉源清研究了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的現狀與發展，指出加速發展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事業的緊迫性；蔡銘澤的論文以史為鑑，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中央日報》作例，透徹地闡釋了國民黨專制主義的新聞政策與新聞自由運動的互動關係；張咏華採取傳媒、社會發展的理論視野，運用文獻閱讀、上網觀察、親身採訪的方法，比較全面、系統地探討近年來上海主要新聞媒體如何面對信息傳播新技術帶來的挑戰和機遇；俞旭、朱立、朵志羣以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為背景，考察香港專上院校新聞教育的歷史發展、面臨的問題

和挑戰。

微觀方面，張國良在調查、比較的基礎上探索上海市民與傳媒互動關係的實態、變遷及趨勢，揭示不少深具學術意義的新發現；羅文輝等採用“內容分析”的方法，研究社會變遷與新聞傳播科技對台灣報紙頭版設計的影響，全文脈絡清晰，內容實在，很有實踐和理論的參考價值；莫季雍的論文考察不同背景民眾如何使用有線電視以及收視行為之差異，研究方法得體，學術味頗濃；吳翠松以傅柯（Michel Foucault）和葛蘭姆西（Antonio Gramsci）的相關理論為框架，結合內容分析法和新聞論域分析法，剖析台灣同性戀議題的變遷過程及影響變遷的因素，該論文對進一步探討新聞傳播與弱勢團體的關係，很有啟示作用；陳家華運用因果框架理論，對香港報章在報道環保新聞時的議題設定，作量化性的探索，論文的發現富現實意義。

大眾傳播研究者克拉克（Wesley Clark）指出：“大眾傳播媒介並非獨自存在，置身於改變我們社會的其他力量之外。媒介不只塑造社會，亦被社會塑造。”¹³ 上述這些研究對了解華人社會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的關係，思考兩者之間如何依存、調和、促進，無疑具有深刻的意義。整體而言，本書中的許多論文都涉及這樣一個迫在眉睫的研究命題：日新月異的傳播和信息科技，究竟如何影響社會、影響傳統的新聞媒介，以及影響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的互動？對此重大命題，作者們從不同的層面作了啟人思索的介紹和描述，但相對而言，深層的理論發掘似嫌不足。

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的理論研究方興未艾。如果要探索出適合華人社會具體情況的理論或理想類型的模式，還期待學者從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各個層面的互動關係進行抽絲剝繭的分析和研究，在學術探討方面繼續不懈地開拓和耕耘。

註釋

- 1 費爾南·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論叢》，顧良、張慧君譯，北京：中央編譯，1997年；《資本主義的動力》，楊紅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2 Cooley, Charles H. (March 1897)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pp. 73-74, p.77, p.81.
- 3 Habermas, J. (1994). "The Tasks of a Critical Theory," in *The Polity Reader in Social Theory* (A. Giddens, et. al. ed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142-149.
- 4 見陳世敏：《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2年，第216頁。
- 5 McLuhan, M. (1996).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all. McLuhan, M. (1967).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New York: Bantam Books.
- 6 同上。
- 7 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朱紅文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85頁。
- 8 雷蒙·阿隆：《社會學主要思潮》，葛智強、胡秉誠、王滙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549頁。
- 9 Goullder, A. (1976). *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 London: Macmillan, Chapter 4.
- 10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1 Schudson, M. (1995). *The Power of New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33.
- 12 Turow, Joseph (1992). *Media Systems in Society*. London: Longman, p.5.
- 13 Clark, Wesley C. (1979). "The Impact of Mass Communications in America", in *Enduring Issu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Everette E. Dennis, Arnold Ismach & Donald M. Gillmore eds.). St. Paul, Minnesota: West Press, p.17.

目錄

變遷的指標 互動的成果

朱立…… i

探討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互動關係的新領域（前言）

俞旭 郭中實 黃煜…… iii

1. 試論中國中央電視台傳播價值觀的變革

孟建…… 1

2. 中國報刊思想史中的三種報刊角色觀

黃旦 丁未…… 17

3. 中國法律體系中的新聞自由

魏永徵…… 37

4. “一種媒介，多種聲音”與“多種媒介，一種聲音”

——國際互聯網絡（Internet）挑戰中國內地新聞傳媒

閔大洪…… 69

5. 中外電子報刊發展的現狀與前景

趙勁…… 93

6. 科技發展與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信息傳播

劉向群 劉源清…… 105

7. 上海大眾傳媒面對信息高速公路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張咏華…… 115

8. 大眾傳媒的內容豐富之後
——傳媒與價值觀念之關係的實證研究
潘忠黨 魏然…… 139
9. 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上海市民與媒介文化
張國良…… 167
10. 台灣報紙頭版設計的趨勢分析：1952－1996
羅文輝 吳筱致 Anna R. Paddon…… 187
11. 台灣電視閱聽人選台行為研究
莫季雍…… 215
12. 專制主義政策和新聞自由運動
——《中央日報》新聞自由運動分析
蔡銘澤…… 241
13. 報紙中的同志
——台灣十五年來同性戀議題的分析
吳翠松…… 253
14. 殖民統治與新聞自由：香港的經驗
杜耀明…… 281
15. 從因果框架理論探索香港環保新聞
陳家華…… 297
16. 香港四所院校新聞教育之比較研究
俞旭 朱立 朵志羣…… 319
- 後記…… 349

試論中國中央電視台 傳播價值觀的變革

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副主任 孟建

中國中央電視台（前身為北京電視台）從1958年5月1日進行實驗性播出，1958年9月2日正式播出，已走過了四十多年的歷程。中國中央電視台（下簡稱中央電視台）經過四十年的發展，不但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具權威、最有影響的國家電視台，而且，也在亞洲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不僅如此，中央電視台也在世界範圍內產生着一定的影響。研究中央電視台在中國以至亞洲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中的影響和作用，是擺在新聞傳播研究者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對傳播價值觀問題的研究，可以說是將哲學研究引入傳播學研究的一種學術拓展（當然，也可理解為傳播學研究向哲學“借火”的努力）。當然“價值”（value）這個詞早在古代就存在了，但形成價值學（axiology）也不過一百多年的歷史。在西方，價值學分為兩大派，一方以美國為代表，認為價值學仍屬於倫理學或元倫理學範疇；另一方面以英國為代表，認為價值學研究全面的價值問題，應當進入任何學科研究領域。後者，已明顯地在學術界佔有了主導地位。¹本文對傳播價值觀研究的看法傾向於羅賓斯。在羅賓斯看來，“價值觀代表了一系列信念，以個人或社會的角度看，某種具體的類型或存在狀態比與之相反的行為類型或存在狀態更可取。”²不過，本文也認為，在傳播價值觀研究